近代早期伦敦鼠疫的社会危害

邹　翔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近代早期,伦敦鼠疫频发,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不仅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工商业正常发展受阻,也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沦丧,从这些危害中可以窥探到灾难面前伦敦社会生活的另一面。

关键词:鼠疫;伦敦;近代早期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1)06-0015-04

黑死病之后,鼠疫在英国消失了一段时间,到了近代早期,鼠疫又在英国频频爆发。学者们大多关注黑死病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对近代早期英国鼠疫的关注则很少。英国著名的医学社会史家威尔森的《莎士比亚时代伦敦的鼠疫》是一部再现 1563—1645 年期间伦敦鼠疫史的力作,但是文章偏重于对社会防疫行动的研究。历史学家保罗·斯莱克的《都铎与斯图亚特时期鼠疫的冲击》也是疫病史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突出了疫病冲击下政府对鼠疫的应对,揭示了近代早期疾病、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另外还有罗德·穆特和多萝西·穆特的《大瘟疫》,对 1665—1666 年的伦敦大瘟疫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以上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伦敦对瘟疫所进行的各种应对措施,却较少涉及瘟疫所造成的危害,以及伦敦市民面对瘟疫的各种消极表现。

实际上,近代早期的鼠疫虽然不像黑死病那样集中爆发,但是它的危害也非常严重,并呈现出地区性、频发性的特征,而伦敦就是鼠疫的频发和重灾区。鼠疫造成了伦敦大量的人口死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伦理道德和信仰也受到了巨大冲击。瘟疫的危害折现了近代早期伦敦社会的另一面历史。

一、鼠疫对人口与社会经济造成的危害

人口大量死亡是鼠疫造成的最直接后果。1592—1593 年伦敦鼠疫爆发时,当时的诗人纳西在诗中道出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死亡气氛:

> 美貌不过是一朵花,终将凋零;智慧也就像那转瞬即逝的空气,倏尔远去。美丽的公主香消玉殒,就像美女海伦的双眸。病魔缠身,死亡就要降临。上帝宽恕我们吧![1]61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在鼠疫发生之时所感受到的生命的脆弱。1602—1603 年的鼠疫更为严重,当时的剧作家托马斯·德克尔在其剧作《美妙的一年》中记下了伦敦以及威斯敏斯特鼠疫肆虐时的死亡画面。

> 在一个小时之前一个人可能还活着,一个小时之后他已经与尘世决绝,很多人在大街上暴亡,有的竟死在阴沟里,在圣彼得堂区,婚礼中的新娘突然死去。鼠疫来到了每一个家庭,降临到每一条街道,染病就意味着死亡,所有的人都哀嚎着:"上帝宽恕我们吧!"但是宽恕并没有到来。死亡仍在继续,除了钟声没有任何音调,而钟声就是在鸣丧,每一刻都有丧钟在敲响,将一个个灵魂带入天堂。[1]97

从 1602 年 12 月到 1603 年 12 月,伦敦市政当局根据堂区的死亡统计表对这一年的死亡人数进行了统计,[2]竟有 29083 人死于鼠疫,而伦敦当

收稿日期:2011-08-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1518-1667)"(09CSS002);曲阜师范大学校级项目"近代早期英格兰防疫法令规章研究"(XJ200815)

作者简介:邹翔(1976—),女,山东莱西人,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维尔康医学史中心访问学者。

万方数据

时的人口估计有 200000，[3]31 也就是说有六分之一的人死于鼠疫。1624—1625 年鼠疫发生的时候，死亡人数也很多，人们在恐惧中纷纷逃离这座城市。当时，一个没有逃跑的修道院长——梅德斯，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住在老天鹅街妇女的逃亡故事，说明人们的恐惧和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这名妇女为了躲避鼠疫，想去萨雷，她取道斯特罕（Streatham），经过克罗约（Croyon），但是她最后迷路了，在恍惚之中她又回到了伦敦，最后望着伦敦城她绝望地说："再见了，伦敦，再见了，鼠疫"，随后她就死去了。后来人们在她胸前发现了来自上帝的警示："梦想躲避上帝之手只是徒劳，上帝无处不在。"这一故事不断被传播，后来又被宣传者加上评注："你可以判断，可以怀疑，但你会发现这是真的。"[4]43 这一年伦敦的死亡人数也很多，当时伦敦的书记官塞缪尔·斯皮德记载了 1624 年 10 月 16 号到 10 月 25 号伦敦城墙内 97 个堂区的总死亡人数，共有 14340 人因病死亡，而死于鼠疫的有 9197 人，疫死者占总死亡人数的近 2/3。[5]4-7

1665 年伦敦大鼠疫最为严重，现存的记载也较多。作家托马斯·维森特在《城市中上帝的可怕之声》中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 秋天到来时，人们就像那落叶，被可怕的风所摇撼，他们随风倒下去了，如落叶一样越积越厚。商店的门关了，路上的行人消失了……几乎每一处都是沉寂……没有马的嘶叫、没有车辆的行踪，没有物品的供应，也没有顾客的喊叫声……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丈夫和妻子共赴黄泉，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父母携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踏上死亡之路。[6]285-286

英国最早的人口统计学家约翰·格兰特则在《可怕的天谴》中对 1665 年这一年中每周的死亡人数作了详细的统计，总共有 55 张统计表，登记了各种死亡原因，男女比例，各个堂区的具体死亡人数，死于疫病的人数。[7] 从 1665 年 10 月 14 到 21 日一个周内发生疫情的堂区有 99 个，各类死亡人数共 1359 人，死于鼠疫的有 1050 人，约占这一周死亡总人数的 77.3%。

从 1519 年开始，伦敦属下的堂区开始统计死亡人数，从 1538 年开始，堂区又有了出生、结婚、死亡的堂区登记表。两者之间进行对比，便可以得出鼠疫死亡人数的较为准确的情况。据此，学者们统计出在伦敦，从 1563 年到 1625 年间因鼠疫而死亡人数是惊人的，（见下表[8]62-63）。

年份	死亡人数	鼠疫死亡人数	伦敦人口	死亡率
1563	20372	17404	85000	24.0
1593	17893	10675	125000	14.3
1603	31861	25045	141000	22.6
1625	41312	26350	206000	20.1

由上表所见，除去 1593 年的死亡率较低之外，其余年份的死亡率都在 20% 以上。

格兰特还对 1570—1670 年这 100 年中的死亡人数进行了统计，伦敦及其郊区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 225000 人，[9]5 死亡之惨重可以想见。

鼠疫也影响了经济，使得生产和商业贸易活动遭受打击。1625 年发生鼠疫的时候，集市、邮局关闭了，甚至皇家汇兑处也关了。绸布尼龙商逃亡去了，昔日繁华的华特林（Watling）大街也空空荡荡，在奇普塞得这一王国的兑换处都无法兑换金条。最不该的是杂货商也跑了，生活用品的供不应求导致了物价上涨。发财的是药剂师、教堂牧师（做临终祈祷的）、内科医生、江湖庸医和棺材铺老板，屠夫和食品商也趁机抬高肉和食品的价格，而从伦敦到郊区农村约 6 英里的路程，马车夫竟索要 40 先令①。正常的贸易活动因为鼠疫的爆发受到了影响。国外不愿意进口伦敦的货物，1603 年法国不再进口英国的毛织品，尤其是英国国内各地生产的粗绒布，据说携带的病菌多，这一年从伦敦出口的童装减少了三成，[10]189 这些都让英国的商人一筹莫展。鼠疫不仅使得伦敦对外贸易停止了，也直接影响了国内的贸易。1625 年伦敦发生鼠疫的时候，高级市政官科凯恩抱怨说，由于担心被传染，外省人不愿意与伦敦商人做生意，即便外省人愿意，伦敦商人既没有钱也无法通过借贷来进行大宗的交易，因为贵族和绅士们在发生鼠疫的时候不愿意冒险将钱用于投资放贷。[10]189 商人的逃跑也使商业活动受到打击，有时候是借款人死亡，有时候是贷款人死亡，伦敦的经纪人往往一边看着死亡统计表，一边收帐。[1]109

二、鼠疫对社会风气与伦理道德的影响

鼠疫造成如此之大的死亡使民众引起强烈反

①英国以前的货币单位，主要由英镑、先令、便士组成，分别用£、s、d 表示，一英镑等于 20 先令，一先令等于 12 便士，其他面值的通行货币还有 1/4 便士、1/2 便士、1 便士、3 便士、六便士。在 1971 年实行十进制之后，旧有的这种比值关系停止，先令、便士相继停止流通。

万方数据

应。这种恐惧,使许多人选择了极端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者挥霍无度、无所事事,或者成为盗贼,四处抢掠。面对鼠疫悲观绝望而选择自杀的人也很多。尽管鼠疫并不一定就会使得每一个感染者都死亡,但是那些感染疾病的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反而选择以一种更为迅速的方式了结生命,以减少死亡道路上的痛苦挣扎。1544 年,一个名叫理查德·萨德的人因为得知自己感染了疾病而举刀自杀。[11]115有的病人如同疯子一般从家中跑出,他们到处乱窜,闯进别人的家里,恶意地把鼠疫传染给其他的人;也有的人因为不堪忍受痛苦,跳入泰晤士河。有些人患病之后,不再信仰上帝,他们赤身裸体,豪饮大吃、纵欲狂欢。"那些看到所有的人都倒下的人,认为信仰上帝与不信仰上帝没有什么区别,违犯人类的法则也不用怕被惩罚,因为每个人说不定被上帝传唤之前就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一点呢?"[1]153

因此,在 16、17 世纪的伦敦,许多人不遵守规定,在大街上,"骂街、诅咒",在客栈和酒馆中"喝酒,大叫和大吃",有人竟称"听着丧钟跳舞唱歌,岂不乐哉?"伦敦到处都是流浪者,许多没有工作的人经常使用暴力,小偷公然抢掠病人和死人的财产,也有不少强盗到伦敦的大道上(highway)进行抢劫,他们都是有武装的,那些留下来看守房子的仆人也担心成为小偷和强盗的牺牲品。这种萎靡消极的生活态度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本已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雪上加霜。

伦敦疫情严重,使得人人自危,因为害怕感染鼠疫,亲朋好友的关照没有了,邻里之爱也不见了。时人称,"鼠疫这种恶疾,没有人能接近或看病人一眼而不得病。父亲不敢看儿子,儿子不敢看父亲。慈爱完全破灭,希望也完全消失了"。[12]177-178 1593 年,一个伦敦人跑到同在伦敦生活的姑妈家,请求到:"好姑妈,帮助我一下吧,我现在生病了,我的妻子也病了。我知道,我也说服自己,现在我和我妻子的任何亲朋好友都不会来探望我们,但是我还是希望您能在这个时候到我家照顾我们一下!"[10]289结果他被拒之门外。

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更加冷酷,由于出逃伦敦的人可能携带鼠疫,使得周围城镇的人惶恐不安。他们对伦敦疫区实行封锁,关闭河道,锁住城门,并在主要的路口派人把守,坚决不接纳来自伦敦的难民,甚至还投掷石头驱赶他们。一切来自伦敦的信件在阅读之前都要放到水中漂洗和火上烘烤,"瞥一眼伦敦人戴的扁平帽或者是衣服的衬领,都会令一个村子的人不寒而栗"。[13]505-506甚至当一个垂死的伦敦人爬进城外一处废旧农场小屋里奄奄一息时,当地人吓得挖了个巨大的坑穴,将整座房屋连同病人一道埋了。有亲缘关系的人,一般也不会收容自己从伦敦而来的染疫的亲朋,对于没有感染疾病的伦敦亲戚,他们也往往退避三舍。1665 年,一个名叫亨利·纽科姆的人,他的表兄从伦敦来到兰开斯特,纽科姆打算赶走他,就对表兄下了委婉的逐客令,他自己后来是这样陈述的,"这么做我也很难过,……因为在当时如果没有警察的同意,就不能够收留人或者是货物……因此,那晚我让他到客栈里住,并说等我得到警察的同意为止。我让他一直呆在客栈,他病得很虚弱,后来他就再也没有找我"。[14]151当时的剧作家托马斯·德克尔对种种背弃伦理道德的行为大为痛斥,称这种世道人心日下的局面比之鼠疫本身更为可怕。[15]15

由此可见,鼠疫造成的心理恐惧是巨大的,它对于传统的伦理观念也是巨大的冲击,普通民众在是否忠于家庭还是爱护邻人或是独善其身方面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教职人员、政府官员对于心系民众还是独善其身也是左右为难,很多人选择了逃跑。许多富有的人携带妻儿老少逃到乡下,市政官员、律师甚至医生也擅离职守。剑桥的高级市政官员萨缪尔·牛顿在日记中写道,他在 1665 年的鼠疫中带领妻儿老小逃到了沃特贝奇,从 6 月一直呆到 10 月,这里与发生鼠疫的城镇相距 6 里。[16]315城市中的高级市政官和治安法官大都逃跑,这些官员的逃走加剧了本来就很紧张的社会气氛,加重了社会的无序状态。市政府关门了,商店和工场也被关闭,这就导致了穷人的失业,工人们因此而发生骚乱,他们扬言如果富人们不回来开业,他们就会烧掉这座城市。[16]319教职人员在这个时候也有变化,在中世纪鼠疫发生的时候,他们往往留下来安置、照顾病人,但是在此时,很多教士都逃跑了。在 1625 年,在伦敦的圣·克莱蒙特堂区只有 3 个教士留下来照顾病人,后来有两个染病而死。

鼠疫除了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社会道德沦丧和秩序混乱之外,还加剧了当时业已存在的贫困问题。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正常的商业活动也基本停止了,家庭解体,仆人也被打发。而大街上聚集了更多的无家可归者,许多人都在等待着社

万方数据

会的救助。1665 年,伦敦大鼠疫发生时,穷人们因为没有工作而挣扎在死亡线上。在平日里,不少穷人可以领取救济金度日,或者依赖富人的慈善救济。但是,在鼠疫发生时,那些逃走的人们,有的人或许不会忘记留下一些财物给这些穷苦人,但是有的富人在逃走的时候分文不留,他们逃命的时候,不仅抛弃了城市,也抛弃了自己的良知。1603 年 7 月 17 日,政府在伦敦各个堂区都委托了两个负责人,由他们负责给穷人募集钱物,但是几乎没有收到任何东西。[1]97

总之,在 16 到 17 世纪下半期近 200 年间,伦敦一直饱受鼠疫的困扰,鼠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扰乱了社会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困。所有这些都表明,鼠疫不仅仅是一个疾病问题,它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反应,这些情况表明,应对鼠疫不仅仅是传染病的防治,它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

参考文献:

[1] F P Wilson. The Plague in Shakespeare's Lond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Worshipful Company of Parish Clerks. A true report of all the burials and christnings within the city of London and the liberties thereof, from the 23. of December, 1602 to the 22. of December, 1603. [OB/OL]. http: // eebo. chadwyck. com: 国家图书馆的数据库文献"早期英文图书在线".

[3] John Morrill.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udor & Stuart Britain [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Anon. The Court and Times of Charles the First [G]. London: 1625.

[5] Samuel Speed. Reflections 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 [G]. London: 1665.

[6] D Defoe.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M]. Everyman edn, 1908

[7] John Graunt. London's dreadful visitation, or, A collection of all the bills of mortality for this present year [M]. 1665.

[8] A L Beier and Roger Finlay. London 1500—1700: the Making of the Metropolis [M].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86.

[9] John Graunt.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 5th edn [G]. London: 1662.

[10] Paul Slack. The Impact of Plagu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M]. London: Routledge, 1985.

[11] R F Hunnisett (ed.). Calendar of Nottinghamshire Coroners' Inquests 1485—1558 [J]. Thoroton Soc, Rec Ser, XXV, 1969.

[12] 周俊,何兆雄. 外国医德史 [M]. 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4.

[13] Ben Weinreb. Christopher Hibbert. The London Encyclopedia [M]. London: London Macmillan Limited, 1984.

[14] R Parkinson (ed.). The Autobiography of Henry Newcome, Chethan Soc [J]. Os Vol Ⅰ, 1852.

[15] Thomas Dekke. London looke backe [M]. London: 1630.

[16] Alan D Dyer. "The Influence of Bubonic Plague in England, 1500—1667" [J]. Medical History, Vol. 22, 1978.

(责任编辑 雪 箫)

万方数据